

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投资结构优化

张中华 刘泽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金融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投资发展与改革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从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及共享五个维度分析了高质量发展与投资结构优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优化投资结构的必要性;考察了目前我国投资领域中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探讨了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高质量发展。研究表明,投资不仅创造需求,还创造供给。要培育创新驱动力、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完成“双碳目标”、形成经济开放新格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用新发展理论引导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新发展理论;有效投资;投资结构;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文章编号:1003-5230(2022)01-0003-11

一、引言

中国近代投资的发展可以上溯至洋务运动。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投资增长屡屡受阻,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我国就展开大规模投资,迅速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投资快速增长,1981~2017年全社会投资累计完成490万亿元,年均增长20.2%。其中,2003~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24%以上,资本形成率在2003年以后提升到40%以上,并于2010年达到47.0%的峰值^①。在投资高速增长驱动下,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然而,2012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资本形成率持续下降,尤其是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2.7%,资本形成率降至43.1%,GDP增速随之降至2.3%^[1]。

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逆全球化趋势显露,资源环境约束愈发吃紧,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过去过分依赖要素投入和能源消耗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为继。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压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成

收稿日期:2021-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18BJY005)

作者简介:张中华(1959—),男,湖南岳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泽圻(1994—),男,江西赣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

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2]。在新的国内经济发展条件和国际发展环境下，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3]。

投资不仅可以创造需求，从需求端拉动经济增长，还可增加资本，从供给端驱动经济发展。投资结构的优化可以改变要素的条件、组合方式和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的作用没有减弱，而是变化了发挥作用的方式和路径。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明确高质量发展与投资结构优化的内在逻辑，增强以投资结构优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必须考察投资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现实条件和国际环境，洞察投资领域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预判未来经济发展态势及其不确定性，探究以投资结构优化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优化投资结构

（一）创新发展与投资

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多个方面。其中，推进科技创新并将科技进步物化为资本，是提高边际资本效率的根本途径。如果没有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随着资本的不断深化，资本的边际效率会逐渐降低，到达一定程度后企业就不愿意继续增加投资，相反还会削减投资，导致经济逐渐衰退。从世界范围看，正是几次重大的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的跃升发展。在当下的中国，无论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满足新的消费需求，还是提升现有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改善生态环境，都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如果说过去我国的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深化来推动经济增长，今后则主要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科技进步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现在缺乏的不是一般性的制造技术，而是缺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新兴技术^[4]。这些技术靠一般性的购买很难引进，需要对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实行战略性并购，更多则要靠自主创新。原始创新不同于引进创新，不能简单靠吸收、消化、适应性改造和集成创新，其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高，不仅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以及完善的试验、检测等配套条件的支持，还需要大量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和组织管理人才^[5]。创新成果的应用更需要投资，因此，为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必须加强研发设施投资，为科学研究、技术和产品创新提供良好的试验、检测条件；必须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导向，扩大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必须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投资，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二）协调发展与投资

要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必须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是投资的目的，但过高的投资率不利于消费和产出的增长^[6]。从长期看，维持经济稳定增长需要投资和消费保持合理的比例^[7]。没有资本的增加，就没有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就业规模的扩大；没有投资的带动，单纯依赖消费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必须充分发挥投资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现期的产业结构是由以往的投资形成的，现期的投资结构又塑造未来的产业结构^[8]。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日趋个性化、多样化和品质化，要适应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必须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为了减少资源消耗，舒缓环境压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也必须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为此，必须推进投资结构的优化：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并购投资与技术改造投资，调整资本存量结构，坚决淘汰过剩低质产能，促进市场出清；另一方面，要着力优化供给结构，增加新供给，培育新经济增长点，提高供给质量。最后，投资还对城乡间、区域间经济发展格局有着重要的影响。投资持续流入一个地区，可能会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投资持续流出一个地区，则可能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退。要形成国土空间布局更加优化，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必须优化投资的区域结构；要促进乡村振兴，必须增加对农村、

农业和农民的投资,优化投资的城乡结构。

(三)绿色发展与投资

从全球范围看,伴随着工业生产迅猛发展,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迅速增加,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明显。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长期采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资源供给日趋紧张,环境压力不断增大。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必须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的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9](P367)}。绿色发展是绿色与发展的有机统一,是要在生态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谋求发展,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实现绿色发展,需要淘汰高消耗、高排放的落后产能,但不应一关了之,否则即使降低了能耗和排放,也会减少供给和就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任务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正确的办法是“量体裁衣”,对过剩产能坚决关停,对刚需产能则进行资本存量的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投资是生产的源头,要实现绿色发展,需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投资项目,但绝不是不投资,也不是单靠减少投资就能实现。绿色发展需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和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减量化生产,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三废”排放;需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积极发展风能、水能、核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需要积极发展碳捕获及碳封存技术,减少碳排放;需要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植树造林、沙漠治理、江河湖泊水体保护工程;需要加强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述措施都离不开投资的支持。

(四)开放发展与投资

扩大开放,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10]。经过4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形成人均GDP超1万美元的巨大国内市场,经济循环以国内为主体是必要的。但是,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是降低开放程度,更不是回到封闭的老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9](P19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国外资本,不仅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还促进了技术扩散、商品和服务贸易,并带来更高的管理水平。转向高质量发展后,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应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提高外资质量和利用水平,也要加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对外投资。就利用外资而言,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要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动能转换、达成低碳绿色的发展目标,就需要积极引进能够满足消费结构转型升级需求的外商投资;积极引进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外商投资;积极引进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研发和生产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投资;积极引进研发实力强、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的跨国企业、国际“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投资。为了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需要加大国际资本与本土化产业链的合作。就对外投资而言,积极发展对外投资,不仅可以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带动对外贸易和对外劳务输出,还有利于增加国内紧缺资源的供给和国外先进研发资源的利用。在新的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下,我国发展对外投资,必须立足于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痛点”和“堵点”,着眼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高供应链完整性、安全性,充分利用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制造业对外投资,向国外转移部分产能;充分利用我国数字经济的领先优势,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充分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积极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投资;积极发展以获取能源、矿产资源为目的的对外投资,以稳定能源、矿产资源的国外供给;积极发展对拥有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企业的并购投资,发展与国外机构的合作研发投资,以利用国外的科技研发资源,促进创新发展。

(五)共享发展与投资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成果,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包括

物质财富的共享和发展权利、发展机会的共享,其目标是要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时下,有关收入分配不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数文献将收入分配不平等局限于劳动收入的差距上,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个人或家庭间收入和财富相当。其实,收入的来源并不仅限于劳动收入,还有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逐步上升的^[11],而这类收入归根到底取决于投不投资、投资多少、投资什么以及投资回报率的高低。近些年,一些民营企业靠实业投资积累了巨额财富;一些家庭靠房地产投资、股票投资实现了财务自由。要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一方面,要鼓励民间实业投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投资兴业,在让各类投资主体平等分享投资机会的同时为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创造条件;要稳步发展金融市场,丰富金融投资工具,为居民投资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另一方面,在实业投资领域要防止市场垄断,在金融投资领域要坚决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如此才能避免因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差别导致财富差距扩大。此外,财富差距也不能简单依据个人或家庭占有的私人财富来衡量,还要考察个人或家庭能享受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12]。事实上,由于人口迁移存在的成本和限制,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甚至同城的不同社区之间,能够享受的公共产品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给个人或家庭的幸福和发展带来的影响往往远大于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这首先要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均等化。总之,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投资就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导向,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着力点,让全体人民共享投资成果。

三、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研发投资结构失衡,创新成果转化率低,制约创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和科研成果产出持续增长。2010~2020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1.75%提高至2.40%^{[1][13]}。2020年我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14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14];2021年我国位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第12位,较2020年上升两位^[15]。然而,我国不仅创新投入强度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而且研发投资结构不合理,成果转化率低:一是基础研究投入水平过低。2010~2020年,我国年均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由328亿元增至1504亿元,占研发经费投入总额的比重由4.7%提高至6.16%^{[1][13]},而美国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其国内研发投入总额的比重平均超过17%^[16]。二是创新投入效率不高。我国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比值约为0.02,而美国这一数据为0.66^[17]。三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我国专利实施率约为6%,远低于美国50%的专利实施率^[18]。四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我国半导体企业接连受到美国的无理制裁和“断供”,更是暴露了我国半导体领域创新能力的缺乏。

(二)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产业投资结构不合理,制约协调发展

1.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0~2020年,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由47.0%下降至43.1%,最终消费率由49.3%上升至54.3%^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提高,土地供给受限,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投资增速下降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投资持续乏力,必将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从投资主体看,目前存在两大隐忧: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升导致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增多、投资意愿下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同时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要进入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还存在不少障碍^[19];加之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降至1.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降至54.9%^[1]。二是地方政府投资难以持续。地方政府普遍债台高筑,可供投资的财政资金捉襟见肘。截至202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25.7万亿元,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约10.0万亿元^[20]。

2.农业投资不足。2010~2020年,农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64%提升至2.52%^{[1][13]},农业生产发展短板依然突出。一是农业机械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使得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设备水平不高,加上农业基础设施体系不完善、设备与基础设施养护不及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

低下。二是农业技术研发投入不足,2012~2017年我国研发机构在农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总研发经费支出比重约为1%^③,总体水平偏低;农业科技创新链上各环节协调效应尚未发挥,导致农业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困难^[21]。三是农产品加工业、物流投资不足。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产值比为2.3:1,远低于发达国家4:1以上的比例,农产品加工转换率低下;农产品物流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水果、蔬菜等产后损耗率高达20%^[22]。四是农业生产投资不足。我国每年粮食产量虽然不断增加,但部分粮食品种供给不足,如大豆严重依赖进口。

3.制造业投资不足。我国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我国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技术缺失,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问题^[23]。近年来,制造业投资结构有所优化,但制造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持续下降。2010~2020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由27.0%降至-2.2%^{[1][13]},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导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制造业产能过剩现象依然严峻,甚至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等行业也由于盲目扩张出现了产能过剩^[24]。

4.社会性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3]然而,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基础建设领域投资少、供给长期不足问题依然严峻,优质医院人满为患,公立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优质中小学学区推动学区房价高涨。另一方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基建如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充电桩等潜在需求旺盛,但由于关键核心技术缺失、技术路线不确定性大、投融资机制不畅等问题导致有效供给相对不足。据统计,2020年中国新基建投资总量约1万亿元,仅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9%^[25]。同时,我国企业对新基建应用层的投资较多,对基础层的投资相对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2020年我国计算机和数字通信设备相关产业的研发投入为全国制造业技术研发总投资的19.72%,而与传统基建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设备产业的研发投入仅占3.28%^[26]。此外,由于技术更迭迅速,新基建不仅面临传统基建常面临的项目融资压力,还需更多的资金注入到新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生态的维护当中^[27]。

5.房地产投资居高不下。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改革住房福利分配制度,房地产投资迅速增长,截至202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高达26.8%^[1]。银行信贷资源过度流入房地产业,挤占其他实体经济投资。2011~2016年,我国房地产贷款增量占金融机构贷款增量的比例由17.5%上升至44.8%;此后房地产信贷增量占比虽有所下降,但2020年仍达26.1%;2011~2020年,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银行贷款余额的比例由19.6%提升至28.7%,年均提升2%;而工业贷款的占比由11.1%下降到6.4%^④;2008~2020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由18.2%持续上升至72.5%,年均增长4.3%^[28],房地产购置贷款增加是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高额的住房贷款负担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占家庭总资产的59.1%,高于美国家庭28.5%;在有负债的家庭中,家庭有住房贷款的多达76.8%,户均住房贷款余额为38.9万元,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达75.9%^[29]。

(三)绿色技术创新不足,环境治理投资短缺,制约绿色发展

2021年11月,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探索发展和保护相协同的新路径。”^[30]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和贡献举世共睹。近年来,我国大力压缩高耗能、重污染企业的产能,积极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产业和环境治理投资,但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承诺相比较仍存在明显差距。2016~2019年间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低了13.2%,但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1]。202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49吨/万元,较上年增长2.2%^[1];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6.7亿吨,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0.7%^⑤。

绿色发展不充分的原因很多,绿色投资不足是主因。一是产业投资结构优化不充分,技术改造投资不足,高能耗、重污染的低端技术产业在我国经济中依然有较高占比。例如,据世界钢铁行业协会

统计^⑥，2020年我国粗钢产量为10.65亿吨，位居全球第一，占世界粗钢产量的56.7%；钢铁出口量达0.51亿吨，为全球第一出口国。二是绿色技术研发投资不足。2014~2017年我国绿色专利申请量仅占总体专利申请量的6.3%^[32]。三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足，结构不尽合理。2011~2017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由1.47%下降为1.16%，而欧盟28国该指标的均值约为2.15%^[3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结构失衡，资金大部分被投入工程建设。四是能源利用结构不合理。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清洁能源消费量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3%^[1]。五是绿色投资缺口大。据红衫中国的估算，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2021~2060年我国绿色投资年均缺口高达3.8万亿。其中，2021~2030年国内绿色投资平均缺口达2.7万亿元，2030~2060年国内绿色投资平均缺口达4.1万亿元^⑦。

（四）涉外投资增速放缓，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制约了开放发展

近年来，尽管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仍在逐步扩大，但增速逐年放缓。2008~2020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924亿美元增至1444亿美元，但同比增长率由22%降至4.5%^[1]。从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比在2020年高达88.4%，与中西部依然保持巨大差距。从外资的来源地来看，亚洲地区外资占50%以上，外资来源地较为集中，对发达国家吸引力不足^[34]。

另一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度增长迅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7年的265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1961亿美元。但是，2020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疫情的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降至1537亿美元，减少21.64%。从投资地区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2020年高达73.1%，其中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投资又占到79.4%。对外投资区域分布不均，不利于分散投资风险，也无法利用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完善、劳动力素质高和技术更加成熟等方面的优势。从对外投资并购看，总体规模下降，结构还待优化。2016~2020年我国对外投资并购由1353亿美元下降至282亿美元，减少79.16%，其中直接投资降至165亿美元，仅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0.7%；对外并购投资行业集中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制造业，分别占并购金额的34.6%和24.7%^⑧。

（五）财产性收入差距大，公共产品供给不均，制约共享发展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然而，距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就共享投资成果而言，还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投资所形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已成为扩大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020年我国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869元，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294元，两者的比值为1:10.2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2.56倍^[1]。居民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近年来，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有所缩减，但财产性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逐渐增加。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财产性收入2791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7%，而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不小差距，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6倍情况下，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却是农村居民的11.04倍^⑨。从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财产性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约为40%，因此，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也意味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二是居民间财富占有存在的显著差距。财产性收入是现有财产带来的净收入，其差距反映了财富占有量的差距。假设资产收入比为10%，10元财产性收入的差距背后则是100元财富占有的差距。可见，财富占有绝对量的差别远比财产性收入绝对量的差别大。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元，前者是后者的1.9倍。家庭总资产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资产的2.6%，而最高10%家庭的总资产占比高达47.5%^[29]。财产性收入并不包括财产升值的部分，居民家庭资产通常也是按账面价值计算的。假设投资者于2000年投资购入100万元/套的住宅，2021年按市场价值已提升为300万元/套。由于居民拥有的财产价值变动不同，有的升值幅度大，有的升值小，按市场公允价值重估，居民财富占有的差别可能更大。三是基本公共设施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不均

等。我国交通道路、通信、供排水、废物处理、养老、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的分布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以义务教育为例，城乡间不仅师资、校舍、教学设备仪器上存在明显差距，教育经费的投入也存在差距。2010~2020年我国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在农村与全国之间的差额逐年扩大，其中小学差额由209.6元增至475.8元，初中差额由317.5元增至1521.3元^⑩。由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农村居民子女上大学难，上好大学更难，而教育不公还会影响就业机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四、优化投资结构，助力高质量发展

(一) 聚焦科技创新投资，促进创新发展

1. 加大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投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到2035年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应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引领，以国家重点科学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检验检测中心、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高端平台为依托，增强人才自主培养能力，积极引进和培育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落实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与知识产权成果资本化的相关制度，激发科技创新人员的活力。要改变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以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作为评价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的主要标准，提高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破除唯论文数量和技术专利数量论，形成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

2. 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要加大政府对大型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投资建设力度。大力增加对科技公共设施的投资，为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试验、检测条件；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发挥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关键作用；营造全民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氛围，拓宽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研究的渠道。不同于社会公益性研究突出需求导向、应用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评价突出市场导向，基础前沿研究必须突出原创导向。

3. 选准科技创新投资的主攻方向。必须聚焦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高端技术和前沿技术；必须立足产业链安全，投资被“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必须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大力发展对新一代信息和生物技术、新能源、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深海空天开发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进行探索性投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35]。

4. 积极扩大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必须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等激励政策力度，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积极性，落实企业创新投资的主体地位；必须大力发展科技银行、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板、科创板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型投融资机制，拓宽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资金来源渠道；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科技创新投资能够获得超额收益，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5. 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投资。通过技术改造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动信息化、智能化和工业化“三化合一”，淘汰落后产品产能，为传统产业增添新的活力。

(二) 注重投资精准定位，促进协调发展

1. 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必须以促进地区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为引领，增加交通运输、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的“补短板”投资。大力推进5G基站、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市轨道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注重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有机结合，让新基建为传统基建赋能，发挥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作用；要注重基础设施供需匹配，规避重复、过度建设。

2. 加大现代农业的投资力度。必须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为导向，大力发展农业良种选育推广、病虫害防治等科技研发投资；大力发展农业水利、供电、机械设备、产品冷藏保鲜运输与仓储设施的投资；大力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投资。

3.加大现代制造业的投资力度。加大产业基础工程投资,加快打牢产业技术基础,补齐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和基础软件、材料及工艺等薄弱短板。增加产业链优化投资,依托行业“独角兽”企业打造更加完整、更加自主可控和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大制造业转型升级投资,推动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提高传统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效能和核心竞争力。

(三)关注投资生态效益,促进绿色发展

1.大力发展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投资。必须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目标,大力推进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等领域的绿色技术投资。要优化能源投资结构,大力发展水电、风能、太阳能、氢能、核能等绿色能源投资,着力解决电力高效传输、储存和利用中的瓶颈问题;增加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绿色生产技术和工艺,减少钢铁、水泥、塑料等工业领域的资源能源消耗,降低废气、污水、废物排放,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在工程建设投资中,积极采用节能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技术;要优化交通投资结构,积极发展绿色、安全、互联的交通体系;要优化农业投资结构,积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要大力发展碳捕获与碳封存技术投资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投资,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贡献中国力量。

2.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投资力度。以生态保护红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为重点,强化对重点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的投资力度;加大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生态保护治理投资力度;持续增加国土绿化投资,加强天然林公益林建设,实施森林质量提升、退耕还林还草、土地综合整治等工程建设;持续增加环境污染基础防治基础设施投资,完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

3.强化对投资项目的环评,科学确定项目选址。要强化建设项目的环评,对环评不合格的项目实行一票否决。严禁投资兴建新的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污染、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的项目。严格禁止在自然生态保护区、水源保护地、湿地公园等生态屏障区和环境敏感区域实施有污染的投资项目。各类投资项目的选址都要综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坚持环境保护设施和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和投产使用;应注重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在保证投资项目施工质量、进度、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节约能源资源,严禁破坏生态环境。

4.强化金融对绿色投资的支持。要完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丰富绿色金融政策工具箱,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创新绿色信贷、碳金融等产品工具;发展数字绿色金融,降低金融机构与绿色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扩大绿色市场参与主体。

(四)扩大投资对外开放,促进开放发展

1.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外资质量和效益。着眼降低外商投资进入的制度成本、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力推进外商投资的便利化,实施“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持续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着眼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效应,多方协力,大力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独角兽”和“隐性冠军”企业投资。着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多措并举,积极引进从事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关键领域核心环节生产研发的外商投资。着眼形成区域发展新格局,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着眼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开拓引进外商投资新领域。

2.促进对外投资健康发展,完善开放经济新格局。充分发挥我国在基础设施设计与建造、建筑设计与施工、水泥等建筑材料生产方面的产业优势,积极利用BOT、BT等方式,组团出海,大力发展对外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加工贸易基地,转移部分国内制造环节和产能,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低要素成本优势。着眼于发挥我国数字经济领先的优势,积极发展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投资。着眼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稳步推进对国外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企业的并购投资、在发达国家投资建设海外研发中心或合作参与核心技术的研发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高端技术和研发人才。拓宽对外投资重点地区,更加关注发展潜力较大地区,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并且谨慎处理各类风险。

(五)加大投资成果共享,促进共享发展

1.大力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要广泛开展投资知识宣传,提升居民投资素养。应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降低投资理财门槛,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拓宽城乡居民金融投资渠道。要健全投资者保护制度,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鼓励民间创业投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投资兴业,支持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在让各类投资主体平等分享投资机会的同时,为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创造条件。同时,要健全资本市场的基本制度,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价等违法行为。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引导资本要素有序健康发展。要坚决打击金融审批、土地出让、投资监管中的各种权钱交易。在产业投资中,要防止少数企业垄断市场,凭借垄断地位获取不当利润。

2.加大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投资。要继续加大对相对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后续帮扶措施,增强贫困地区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能力,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

3.加大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投资力度。在大力增加农业科技创新、农业设施建设、农业生产、农产品深加工和冷链物流投资,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的同时,加大农村交通道路、供水排水、通信网络、垃圾污水处理、环境整治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缩小城乡公共设施水平的差别;增加对农村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服务设施与设备的投资;提高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水平,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条件。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为农村土地资本化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

4.加大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应向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倾斜,向民生领域投资倾斜。应在补齐经济性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着力发展学龄前教育与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与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灾害防控、公共文化体育、养老服务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要扩大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开放范围,推行负面清单制度,以合理透明的价格机制稳定社会预期,提高民营资本参与积极性;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及特许经营权融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确保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5.严格控制住房投机性炒作。严格落实有关房地产信贷的政策,严格控制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严格控制对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抵押贷款。尽快出台房产税,提高非居住持有住房的成本。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在严格控制住房投机性炒作、空置的同时,加大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投资,加大城市老旧小区公共设施改造升级的投资力度,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五、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然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旧突出,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是发展质量不高。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任务艰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同富裕任重道远。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相统一,在努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投资既创造需求,又创造供给,投资结构的优化可以改变要素的条件、组合方式和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低、创新投入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制约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社会性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而房地产投资占比居高不下,制约协调发展;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投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足,能源投资结构不合理,制约绿色发展;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增速放缓,投资结构失衡,制约开放发展;财产性收入差距明显,公共产品供给不均,制约共享发展。要培育创新驱动力、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完成“双碳目标”、形成经济开放新格局、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实现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就

必须深化对新发展理论的认识,明确高质量发展与投资结构优化的内在逻辑,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在新时代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谱写新的宏伟诗篇。

注释:

-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
-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
- ③数据来源:EPS数据平台—中国科技数据库.
- ④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1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EB/OL].(2012-01-30)[2021-11-30].<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2888488/index.html>.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6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EB/OL].(2017-01-20)[2021-11-30].<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3240323/index.html>.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EB/OL].(2021-01-29)[2021-11-30].<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180902/index.html>.
- ⑤数据来源:Global Carbon Atlas.<http://www.globalcarbonatlas.org/en/CO2-emissions>.
- ⑥数据来源:世界钢铁协会.<https://www.worldsteel.org/zh/steel-by-topic/statistics/World-Steel-in-Figures.html>.
- ⑦数据来源:红杉中国.迈向零碳——基于科技创新的绿色变革.[EB/OL].(2021-04-22)[2021-11-30].<http://finance.eastmoney.com/a/202104221897304711.html>.
- ⑧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1.
- 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
- ⑩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2011-11-23)[2021-11-3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1112/t20111223_128871.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2021-11-12)[2021-11-3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5/s3040/202111/t20211130_583343.html.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21-03-01(10).
- [2] 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4(6).
- [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1).
- [4] 苗圩.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J].求是,2018(14):27—29.
- [5] 陈劲,宋建元,葛朝阳,朱学彦.试论基础研究及其原始性创新[J].科学学研究,2004(3):317—321.
- [6] 李建伟.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经济学动态,2003(3):9—13.
- [7] 贺铿.中国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政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3—10.
- [8] 张中华.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决定的理论考察[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5):15—23.
-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0] 蒲清平,杨聪林.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6(6):24—34.
- [11] 刘兆征.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分析及增加对策[J].经济问题探索,2009(7):34—40.
- [12] 李海舰,杜爽.推进共同富裕若干问题探析[J].改革,2021(12):1—15.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11-03-01(13).
- [14] Dutta, S., Lanvin, B., Wunsch-Vincent, S. The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0: Who Will Finance Innovation? [R]. Cornell University, INSEAD and WIPO, 2020.
- [15] Dutta, S., Lanvin, B., León, L. R., Wunsch-Vincent, S.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1: Tracking Innovation through the COVID-19 Crisis [R].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21.
- [16] 袁芳,王娟.美国研发投入现状研究[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20,35(5):11—19.
- [17] 沈健,王国强,钟卫.科技成果转化的指标测度和跨国比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37(7):58—64.
- [18] 沈健.我国大学专利转化率过低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5):97—103.
- [19] 丛书编写组.合理扩大有效投资[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21:181.
- [20]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3):562—565.
- [21] 赵淑芳.我国农业科技投入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9,37(3):123—127.
- [22] 杜思梦,刘涛.基于新发展理念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问题及举措[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21,23(3):18—24.
- [23] 黄群慧.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N].经济日报,2020-01-21(11).

- [24] 王辉,张月友.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产能过剩吗?——以中国光伏产业为例[J].产业经济研究,2015(1):61—70.
- [25] 郭斌,杜曙光.新基建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机理与政策创新[J].经济体制改革,2021(3):115—121.
- [26]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财政部.2020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N].中国信息报,2021-09-23(1).
- [27] 王雨辰.“新基建”视域下的基础设施供给方式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21(5):194—200.
- [28] 阮健弘,刘西.近年来我国稳杠杆促增长取得显著成效[EB/OL].(2021-05-01)[2021-11-30].<http://www.pbc.gov.cn/redianzhuanti/118742/4122386/4122510/4242269/index.html>.
- [29]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EB/OL].(2019-04-24)[2021-11-30].<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lczz/2020-04-24/doc-iirczymi8099086.shtml>.
- [30] 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N].人民日报,2021-11-02(1).
- [31] 田智宇.“十四五”推进绿色发展的挑战、机遇与路径[J].中国经贸导刊(中),2020(12):106—108.
- [32]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划发展司.中国绿色专利统计报告(2014~2017年)[EB/OL].(2018-08-15)[2021-11-30].<https://www.cnipa.gov.cn/20180829161402137643.pdf>.
- [33] 逯元堂,徐顺青,陈鹏,朱建华,高军.我国环保投资分析及对策建议[J].环境保护,2017,45(17):7—10.
- [34] 李志翠,马雪梅,陈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的实践、成效、经验及对策[J].国际贸易,2019(12):58—67.
-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N].人民日报,2021-03-13(1).

The Optimization of Investment Structure in the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ANG Zhonghua LIU Zeqi

(School of Finance,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China has started a new journe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facing many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invest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studies the imperative of improving investment structure, from five dimension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We also study the prominent problems in China's investment sector restric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iscuss how to adjust investment structur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vestment not only creates demand, but also creates supply. In order to build up innovation drive, shore up points of weakness, achiev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reach a new stage of the opening-up and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we nee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investment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focus on optimizing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thus we can play a key role of investment in improving the supply structure, and ultimately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Effective Investment; Investment Struc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陈敦贤)